

從中國文學的視域看丁若鏞的文學觀點

安贊淳

一、緒論

丁若鏞(1762-1836)，是生當朝鮮後期的大學者。因其受家學和時代風氣的影響，自早對專以程朱理學為重的時風有所不滿，想摸索一條新的儒學解經途徑，終算成了一位當今國內外所公認的朝鮮‘實學’的代表人物。因他在學術上有卓越的建樹，故在朝鮮儒家學者裏面一向與李滉、曹植、李珣等並稱，備受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

因他治學途徑以及思想比較多樣複雜，所以甚至還人被質疑為有‘反朱’的傾向。不過從筆者的觀察，這種見解多半是對其學術的誤解造成的。即雖有不同意見或對朝鮮性理學末流有不少反感，但其言論始終不失為孔孟聖學之流裔。只不過他的思想已經不能僅以理學所能籠絡而已。我們知道，他是公認的朝鮮‘實學’的集大成者，而朝鮮‘實學’之產生雖有諸多成因，可我們看當時朝鮮在面臨不斷的內憂外患以及各種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的情況之下，當時的不少有識之士已開始覺醒，而茶山亦即其中之一，認為僅靠已流於空疏的理學無法挽救時代所面臨的諸般問題，由而新的風氣也就因應而形成。

‘實學’之稱本與‘空疏之學’相對而言，是以經世致用為重的‘實’的學問，很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和清朝乾嘉學術由宋明理學(尤以晚明王學為然)轉向‘考據’再而‘經世致用’之學的演變軌跡頗有相通之處。雖因朝鮮與清朝兩國國情不同，故其具體成因未必一致，可究其主要形成原因，不可否認確有類似之處，這些也是本研究將關注的問題之一。

從丁若鏞(1762-1836)與李滉(1502-1571)、曹植(1501-1572)、李珣(1536-1584)等四人中，以退溪李滉為首的前三者活動年代相當於明代王學開始興起、文壇有王世貞(1526-1590)等後七子所生存的年代，只有茶山丁若鏞(1762-1836)的生存年代比起前三位晚二百幾十年，相當於清朝的乾嘉(1736-1836)學術興盛之期。該期朝鮮儒學已有由從‘程朱學’轉向‘實學’的跡象。這

類似於中國儒學到清代也已從朱王理學往乾嘉之學有所轉變，即，朝鮮的性理學的中心也已逐漸往重視經世致用的‘實學’方向發展。

茶山的著作之丰可謂是朝鮮之冠，其學問所涉及範圍亦甚為廣泛，如經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物理、醫學、西學以及文學等幾無所不包。不過，總體而言，他一生以學術為重，不甚重視文學和文學行為。因此，學界對茶山學術之研究雖有多方面，可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有關茶山的研究大多還是聚焦在以其經學和哲學為主的學術領域。不過，我們看他文集有經常和學界同期人物、親友、弟子、兒子用書簡贈答時有需要表述其有關文學的見解，另外也因他本身文學才華橫溢，時有佳作。如今流傳的詩歌作品就共有2487首之多¹⁾，我們單據這一點便足以顯見他在文學方面的成果。因此，國內外學界對他有關文學的研究亦如下參考資料所列亦為數不少。只不過多把重點放在朝鮮本土之內，可本稿認為當時朝鮮儒者既然和中國學術之間一直有密不可分的聯繫，所以我們的研究視野也應放寬點，不妨從中國學術和文學的角度審視茶山文學觀點所具有的另一番意義和價值。

二、茶山對時代文學大環境的觀點

我們討論茶山的文學觀點前，有必要了解一下他做為代表一時的大學者面對學術、文學大環境有何看法。因為我們一般認為茶山是想從籠罩在整個朝鮮學術的理學風氣中走出來摸索新的學術路徑的學者，雖說茶山的學術思想和文學觀點之間未必有絕對的關係，但我們也可以從他做為一大學者對同時代的學術、文學大環境的見解中看出他具有那些觀點的緣由之端倪。以下，將舉本稿認為較具代表性且影響較大的三大背景，再看茶山有關的觀點。

1. 對朱子及朱子學的看法

就中國明、清兩朝的學術來說，固然有程朱學、陸王學、考據學、經世之學

1) 전경원,〈다산(茶山)정약용(丁若鏞)의 시경론(詩經論) 및 시의식(詩意識)〉겨레언어문학 제30집, 頁55

之分，但歸根結底還是同樣對儒家文本採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和關注點所導致的儒門內的分歧而已。因為就當時上層士人子弟而言，為進入官場、光宗耀祖，則參加科舉便是必經之路，所以無論明、清任何一代凡要做學問，以朱熹《四書集注》為首的儒家經典是必讀之書。也因此，當時士人的治學自然而然就從程朱理學入手，而在這一點上朝鮮士人子弟也與中國基本相同。如丁茶山曾說：

性理之學，所以知道認己，以自勉其所以踐形之義也。……古之為學者，知性之本乎天，知理之出乎天，知人倫之為達道，以孝弟忠信，為事天之本，以禮樂刑政，為治人之具，以誠意正心，為天人之樞紐。……今之為性理之學者，曰理曰氣，曰性曰情，曰體曰用，曰本然氣質，理發氣發，已發未發，單指兼指，理同氣異，氣同理異，心善無惡，心善有惡，三幹五極，千條萬葉，毫分縷析，交噴互嚷，冥心默研，盛氣赤頸，自以為極天下之高妙。……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同者戴之，殊者伐之，竊自以為所據者極正，豈不疎哉？……乃其所自倚以文之，則曰：“我尊尚朱子。”嗚呼！朱子何嘗然哉？研磨六經，辨別真偽，表章四書，開示蘊奧。入而為館閣，則危言激論，不顧死生，以攻人主之隱過，犯權臣之忌諱，談天下之大勢，滔滔乎軍旅之機，而復讎雪恥，要以伸大義於千秋。出而為州郡，則仁規慈範，察隱察微，以之平賦徭，以之振凶扎。其宏綱細目，有足以措諸邦國，而其出處之正也，召之則來，捨之則藏，拳拳乎君父之愛，而莫之敢忘。朱子何嘗然哉？沈淪乎今俗之學，而援朱子以自衛者，皆誣朱子也。朱子何嘗然哉？雖其修飾邊幅，制行辛苦，有勝乎樂放縱邪淫者，而空腹高心，傲然自是，終不可以攜手同歸於堯、舜、周、孔之門者，今之性理之學也。²⁾

茶山的文集裏談論朱子之學的基本皆與此同調，他以“今之為性理之學者”表示不以為然後，用“朱子何嘗然哉”的口吻來表示他對朱熹本身還是推崇備至的，將“今之為性理之學者”和朱學本身明確區分開來的。他所反對的是那種“沈淪乎今俗之學，而援朱子以自衛者，皆誣朱子……空腹高心，傲然自是，終不可以攜手同歸於堯、舜、周、孔之門”的“今之性理之學”。也就是反對的並不是朱子學本身，而是已偏離朱子之學而盜用其名義的“今之性理之學”而已。他無法認同“今之性理之學”的最主要理由是因為“今之為性理之學者”“終不可以攜手同歸於堯、舜、周、孔之門者”，所以加以反對，可知茶山治學是以“可以攜手同歸於堯、舜、周、孔之門”為終極目

2) 《與猶堂全書》，第一集詩文集第十一卷○文集 / 論 五學論一 / 性理之學。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MO_0597A_0110_010_0290_2004_A281_XML

的。

總之，丁茶山感到不滿的不是朱子及朱子學本身，而是朱子學末流所造成的不良學風。

2. 對陸王學的看法

陸王之學起於南宋，興盛於明代中期以後，尤其到明代中晚期經過陳獻章、王陽明等人，王學已明顯有壓倒程朱之學的局面，幾乎成了晚明學術界的主流，至少也是明代中晚期與程朱理學分庭抗禮的學術流派。但王學在朝鮮則與此情況有顯著的差異，即陸王之學始終被朝鮮朝野視為異端，不僅無法得到朝鮮主流社會的認可，甚至被嚴禁，所以始終也無人敢公然問津。而丁茶山生當朝鮮後期，已知道王學曾在中國之盛況，也有機會看到有些人引進的陸王之學，故對之表示自己的看法說：

王陽明以致良知三字，為法門宗旨。遂以《大學》之致知為致，孟子所云‘不學而知之良知’，重言復言而不知止，謂自家一生得力，只此三字。察其語深信不疑，欣然自得，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嗚呼！此陽明之所以為賢者，而陽明之學之所以為異端也。凡立一句語為宗旨者，其學皆異端也。為己，君子之學也，聖人嘗言之矣。楊氏立為己二字為宗旨，則其敝為拔一毛不為，而成異端矣。尊德性，君子之學也。聖人嘗言之矣。陸氏立尊德性三字為宗旨，則其敝為弄精神頓悟，而成異端矣。

良知之學，何以異是？獨恨夫以陽明之高文達識，曾不知致與良之不得相屬，而翹千古所無之說，以示天下萬世之人而不疑，何蔽之至是也？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程子曰‘良知出於天，不繫於人’，即良者，自然之意也。故不糞而肥，謂之良田，不騁而馳，謂之良馬，良也者，本善之謂也。夫所謂致者，何謂也？彼不自來，而我為之設法以來之曰致也，吾不可自得，而求彼以相助，使之至曰致也。良知者，既已良知，何為致之？余故曰，良則不致，致則非良，既良而復致之，天下無此事也。孩提之愛其親，豈用意設心而致之乎？此蒙士之所不肯言，而陽明言之，何蔽之至是也？雖然，陽明則其真得力於此者也。陽明之性，樂善好勇，凡有善心萌於中，即銳意果行而莫之回顧，曰此良知也。於是學此者，凡有發於心，不細察徐究而直行之，曰此良知也。陽明資質本善，故以之為善者多，他人資質不清，故以之為惡者衆。此陽明之能自託於賢

者，而其徒之爲群盜也。故人於其自得而自樂也，正所以生大患也。吁，可畏也！³⁾

丁茶山開宗明義就斷定分別爲陸王的法門宗旨的‘尊德性’和‘致良知’之學爲異端。他並認爲‘尊德性’、‘致良知’和先秦楊氏‘爲己’一樣，雖然其本身皆可不失爲‘君子’、‘聖人’之學的，不過他根據但“凡立一句語爲宗旨者，其學皆異端”的說法認定他們之學也是異端。不過我們從茶山“獨恨夫以陽明之高文達識，曾不知致與良之不得相屬”以及“陽明則其真得力於此者也。陽明之性，樂善好勇，凡有善心萌於中，卽銳意果行而莫之回顧，曰此良知也。於是學此者，凡有發於心，不細察徐究而直行之，曰此良知也。陽明資質本善，故以之爲善者多，他人資質不清，故以之爲惡者衆。此陽明之能自託於賢者，而其徒之爲群盜也。故人於其自得而自樂也，正所以生大患也。吁，可畏也！”等文字看來，茶山雖在指責陽明在以“致良知”立爲其“宗旨”的過程中“銳意果行而莫之回顧”、“不細察徐究而直行之”的失誤，但並不全盤否定陽明及王學本身，而我們可知道茶山真正否定且歸咎的是陽明末學“資質不清，故以之爲惡者衆”“其徒之爲群盜也者”的事實。從而可知，丁茶山對陽明還是有部分肯定且深表遺憾之情。卽，雖也不無微詞，但這就一位朝鮮學者而言，已屬難能可貴的。我們可推測，茶山這種見解是出自他生當朝鮮後期，程朱學在學術界的統治地位已不能與朝鮮盛世相比所致。更何況如前所提“今之爲性理之學者”已弊端百出，在無法一味擁護的情況之下，茶山自己也在治學上尋求另辟新路的過程中，所以比起前輩學者相對能够自由地實事求是、就事論事的結果。

3. 對科舉學的看法

科舉是古代士人子弟爲謀求出仕以光宗耀祖，必選之路。歷朝爲選拔天下英才施行科舉確有其正面的功能，只是從各朝科舉的施行以來，無論是哪一朝都產生出不少的弊端。就文學方面的影響來說，明代以後用刻板的八股取士，不但造成當時文風的敗壞，科舉的種種弊端都成了明清時期很多著名小說、戲曲等作品的素材乃

3) 《與猶堂全書》，第一集詩文集第十二卷○文集 / 辨 / 致良知辨。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MO_0597A_0120_020_0100_2004_A281_XML

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因其弊端五花八門，所以歷來文人對科舉的看法也有所不同。茶山對“科舉之學”也有自己獨到的看法。以下逐段看他專文裏面的的觀點，他說：

主斯世而帥天下，以倡優演戲之技者，科舉之學也。讀堯、舜、周、孔之書，斥老、佛、回、黃之教，其譚詩禮，其論史傳，天然一冠儒服儒者也。夷考其實，剽字竊句，抽朱擢綠，以眩一時之目，而堯、舜非所慕也，老、佛非所惡也，治心檢身之法，非所問也，匡君澤民之術，非所意也。⁴⁾

他在此直接把科舉之學說成是“以倡優演戲之技者”，意思就是從表面看上去是“讀堯、舜、周、孔之書，斥老、佛、回、黃之教，其譚詩禮，其論史傳”的一副道貌岸然的“天然一冠儒服儒者”，不過看他們實際是“剽字竊句，抽朱擢綠，以眩一時之目，而堯、舜非所慕也，老、佛非所惡也，治心檢身之法，非所問也，匡君澤民之術，非所意”的事實。也就是實際上只不過剽竊古人的文字以眩惑人之耳目。再從思想內涵指責，參加科舉之士並非以儒家“堯、舜”、“治心檢身之法”、“匡君澤民之術”為旨歸，也不排斥“老、佛”等異教，故也不純正。

項羽、沛公之事以為題，澆佻悖戾之辭以為能，吐虛吹假，構幻織誕，以自銜其瞻博之聞，以賭一日之捷而已。有為性理之學，嗔之曰詭，有為詰訓之學，叱之曰僻。睥睨文章之學，而自視未嘗非文章，入者霸之，出者夷之，工者仙之，拙者隸之。有或微幸以成名者，父撫之曰孝子，君慶之曰良臣，宗族愛之，朋舊尊之。其落拓而不得志者，雖行如曾、尾，智如樗、犀，率龍鍾蕉悴，齎哀恨以死。嗚呼！此何法也？

這段裏丁茶山在說，科舉還以無關儒家‘王道’而近‘霸道’的“項羽、沛公之事以為題”，應考者便以“澆佻悖戾之辭以為能，吐虛吹假，構幻織誕，以自銜其瞻博之聞，以賭一日之捷而已。”的事實。這似乎在指以浮誇為能事的漢賦和魏晉南北朝的志人、志怪等而言。並也在指出，又有些人因自己見識不足眼光狹窄之故，竟視“性理之學”為“詭”、“詰訓之學”為“僻”而排斥不學，口裏又說鄙視“文章之學”，但實際他們所做的“未嘗非文章”的事實。應考者和家長以及親朋好友因唯考取為至上目標，

4) 《與猶堂全書》，第一集詩文集第十一卷○文集 / 論 五學論四/科舉之學。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MO_0597A_0110_010_0320_2004_A281_XML

對考場的得失看得也過重，所以茶山對導致“入者霸之，出者夷之，工者仙之，拙者隸之。有或徼幸以成名者，父撫之曰孝子，君慶之曰良臣，宗族愛之，朋舊尊之。其落拓而不得志者，雖行如曾、尾，智如樗、犀，率龍鍾蕉悴，齋哀恨以死。”的可笑又殘酷的陋風深深表示慨嘆之意並很不以為然。

衆黎之生，于于然蠢蠢然，其可以績文史導政事者，千百一人而已。今也，括天下聰慧之才，壹皆投之於科舉之臼，而春之撞之，唯恐其不破碎靡爛，豈不悲哉！一陷乎科舉之學，即禮樂爲外物，刑政爲雜事，授之以牧民之職，則蒙蒙然唯吏指是承，入而爲財賦、獄訟之官，則尸居素食而唯故例是問，出而操甲兵、捍禦之權，則曰軍旅未之學也，推武人以居前列。天下將安用矣？

還說“其可以績文史導政事者，千百一人而已。”，也就是通過這樣的科舉選拔出來的人才裏面在實際“政事”上真正能有作爲的才“千百一人”而已的事實，在批判所學非所用的科舉的現實效用。再看下面，他說：

日本者，海外之小聚耳，以其無科舉之法也。故文學超乎九夷，武力抗乎中國，規模綱紀之所以維持控馭者，森整不亂，有條有理，豈非其顯效哉？

他說日本雖只不過是“海外之小聚”，可日本之所以能够“文學超乎九夷，武力抗乎中國，規模綱紀之所以維持控馭者，森整不亂，有條有理”，就是因爲他們“無科舉之法也”。就是誇日本之“文學超乎九夷”、“武力抗乎中國”、“規模綱紀之所以維持控馭者”、“森整不亂，有條有理”，然後將其功都歸結到日本“無科舉之法”的緣故。儘管這未必符合事實，但我們至少可以從這段的敘述中看出茶山對科舉之學的嚴厲的批判態度。

今科舉之學，亦已衰矣。巨室名閥之子，不肯業此，唯田間寒餓者爲之，而戰藝之日，嘯呼市井奴隸，摺巾短襦，怒目豪拳，以爭其先登，但見簽竿相戳，楫槳互擊，而及其唱名也，乳臭之兒不辨豕亥者，出而據之，斯其學不能不衰敝也。若天眷顧，因其衰而遂變之，則生民之福。不然，不可與學此事者，攜手同歸於堯、舜之門也。⁵⁾

最後一段，茶山在說，如今科舉之風已式微，之前尚有名門世族之子弟參與，可現在是到衰敗，只有如“市井奴隸”般無根無本的參與競爭，故導致科舉之“學也不能不衰敝”的事實。最後還盼望科舉寧可“趁其衰退而遂變之”。我們從最後“不然，不可與學此事者，攜手同歸於堯、舜之門”，可知他認為做學問的最終目的是要“攜手同歸於堯、舜之門”，也隱然認為不如“趁其衰退而遂”廢除之意。

我們可以從以上茶山有關朱子學、王學、科舉之學的說法看出，他雖對朱子推崇有加，而他學問的宗旨似乎已不停留在朱子‘成聖’工夫上，而向“攜手同歸於堯、舜之門”靠攏，即想恢復到古聖賢之學。也就是有從宋明理學‘內聖’轉向傳統儒家的‘外王’上的迹象。而這些背景思想都直接影響到他的文學觀點，成為他決定其文學觀點的重要因素。比如，他批評韓、柳等古文家謂“韓、柳、歐、蘇，其所謂序記諸文，率皆華而無實⁶⁾，奇而不正，幼而讀之，非不欣然善矣。內之不可以修身而事親，外之不可以致君而牧民，終身誦慕而落魄牢騷，卒之不可以為天下國家，此其為吾道之蠹螫也。……彼韓、柳、歐、蘇，其所自命者，文章已矣。文章豈足以安身立命哉⁷⁾”，可見其評估文章的主要標準也在“內之不可以修身而事親，外之不可以致君而牧民，終身誦慕而落魄牢騷，卒之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上。

三、從中國文學的視域看丁茶山文學觀點

茶山的文學觀點裏面值得我們注意的主要有文道論、文體改革論、詩文創作論以及對‘詩三百’、屈騷、陶謝、杜甫、唐宋八大家、明清小說和戲曲、清代文人的評估等，涵蓋面較為廣泛。而他對這些的觀點有的用專章討論，有的散見在諸多書簡等個別篇章裏面。有的時候因其論文立場不同或有的時候隨其遭遇的不同，往往有前後不一致的地方，但就整體而言還算保持著比較一貫的觀點。本稿由於時間和篇幅的關係，這一篇就把主要探討的範圍限在文道論、文體改革論、詩文創作論這三

5) 《與猶堂全書》，第一集詩文集第十一卷○文集 / 論 五學論四/ 科舉之學。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MO_0597A_0110_010_0320_2004_A281_XML

6) 像“華而無實”是我們用來批評駢儷文之弊的字眼，可丁茶山却以此批評韓、柳、歐、蘇，可見他認為他們所謂‘道’的含量不予認可。

7) 《與猶堂全書》，第一集詩文集第十一卷○文集 / 論 /《五學論三》/ 文章之學。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MO_0597A_0110_010_0310_2004_A281_XML

點上，以見其主要文學觀點之一斑。至於丁茶山對對‘詩三百’、屈騷、陶謝、杜甫、唐宋八大家、明清小說和戲曲、清代文人的評估等問題，將在另一篇專稿裏詳細探討其相關內容和其所具意義等問題。

1. 文道觀

其實，論一位儒學氣息較濃厚的人文學者的‘文道’觀，多大同小異，很難有什麼特色，可是我們看茶山對‘文道’及文章的觀點具有比較大的特色。他的這些觀點主要見於其〈五學論三〉中專題討論文章之學⁸⁾，很值得我們詳細探討，如他說：

文章之學，吾道之鉅害也。夫所謂文章者，何物？文章豈掛乎空布乎地，可望風走而捉之者乎？古之人，中和祇庸，以養其內德，孝弟忠信，以篤其外行，詩書禮樂，以培其基本，春秋、易象，以達其事變，通天地之正理，周萬物之衆情。其知識之積於中也，地負而海涵，雲鬱而雷蟠，有不可以終闕者，然後有與之相遇者，或相入焉，或相觸焉，撓之焉，激之焉，則其宣之而發於外者，渤潏汪濊，粲爛煜雪，邇之可以感人，遠之可以動天地而格鬼神，斯之謂文章，文章不可以外求也。

故文章之在宇宙之間，其精微巧妙者《易》，溫柔激切者《詩》，典雅縝密者《書》，詳細而不可亂者《禮》，條鬯而不可糅者《周禮》，瑰奇吐欲而不可屈者《春秋》左氏之《傳》，睿聖無瑕者《論語》，真知性道之體而劈析枝經者《孟子》，刻覈深窈者《老子》，下此以往，醇者或寡矣。

太史遷好奇尚俠，而自外乎禮義，揚雄不知道，劉向溺於讖諱，司馬相如俳優以自銜，下此以往，破碎綺靡無譏焉。韓愈、柳宗元，雖稱中興之祖，而本之則亡，如之何其興之也？文章不自內發，迺皆外襲以自雄，斯豈古所謂文章者哉？韓、柳、歐、蘇，其所謂序記諸文，率皆華而無實，奇而不正，幼而讀之，非不欣然善矣。內之不可以修身而事親，外之不可以致君而牧民，終身誦慕而落魄牢騷，卒之不可以為天下國家，此其為吾道之蠹螫也。將有甚乎楊、墨、老、佛。何也？楊、墨、老、佛，雖其所秉有差，要之皆欲以克己斷慾，為善去惡。彼韓、柳、歐、蘇，其所自命者，文章已矣。文章豈足以安身立命哉？……

今之所謂文章之學，又以彼四子者，為淳正而無味也。祖羅、祧施、郊麟、禘螺而尤侗、錢謙益、袁枚、毛甡之等，似儒似佛，邪淫譎怪，一切以求眩人之

8) 《與猶堂全書》，第一集詩文集第十一卷○文集 / 論 / 文章之學。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MO_0597A_0110_010_0310_2004_A281_XML

目者，是宗是師。其爲詩若詞，又淒酸幽咽，乖拗犖確，豈是可以銷魂斷腸則止，遂以是自怡自尊，而不知老之將至。其爲吾道之害，又豈但韓、柳、歐、蘇之流而已？口譚六經，手擷千古，而終不可以攜手同歸於堯、舜之門者，文章之學也。9)

他這篇論“文章之學”的要旨在於對當時人所謂的“文章之學”表示很不以爲然，認爲那是“吾道中之鉅害”，而認爲够格的文章應該要“以五經爲本，要以詩書禮樂以培其基本，以春秋、易象以達其事變通天地之正理周萬物之衆情。其知識之積於中也……而發於外者，渤涌汪濊，粲爛煜雪，邇之可以感人，遠之可以動天地而格鬼神，斯之謂文章，文章不可以外求也。”。如此說來，在丁茶山心目中，唯有經書方是够格的文章。不過值得我們一提的是他接著還說“故文章之在宇宙之間，其精微巧妙者《易》，溫柔激切者《詩》，典雅縝密者《書》，詳細而不可亂者《禮》，條鬯而不可糲者《周禮》，瑰奇吐欬而不可屈者《春秋》左氏之《傳》，睿聖無瑕者《論語》，真知性道之體而劈析枝經者《孟子》，刻覈深竅者《老子》”，如此竟把《老子》與儒家經典相提並論，並放在他所肯定的文章之列，這一點是與一般典型的儒家文人的看法很不一樣的。除了這點外，這些見解從表面看似和劉勰、唐宋古文家和宋代理學家等汎儒家的言論都很接近。可也有所不同的是，丁茶山之所以不取“韓、柳、歐、蘇”的原因是他認爲這四人的文章“內之不可以修身而事親，外之不可以致君而牧民，終身誦慕而落魄牢騷，卒之不可以爲天下國家”，可見他對文章的要求是在除了唐宋古文家和理學家的基本觀點外，還特別強調文章要有內之可以修身而事親；外之可以致君而牧民；卒之可以爲天下國家的效用，即茶山認爲他們的文章是無補於‘經世致用’的目的。這一層的意思雖在韓愈、朱熹等處也偶爾可見，但都沒有這麼具體強調過。

另外，下面他還接着對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等古文家加以痛斥認爲“韓愈、柳宗元，雖稱中興之祖，而本之則亡，如之何其興之也？文章不自內發，迺皆外襲以自雄，斯豈古所謂文章者哉？韓、柳、歐、蘇，其所謂序記諸文，率皆華而無實，奇而不正”，甚至還認爲是“吾道之蠹螿”，再甚至還說其禍害“更甚乎楊、墨、老、佛”，那是因爲“楊、墨、老、佛，雖其所秉有差，要之皆欲以克己斷慾，爲

9) 《與猶堂全書》，第一集詩文集第十一卷○文集 / 論 / 文章之學。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MO_0597A_0110_010_0310_2004_A281_XML

善去惡。彼韓、柳、歐、蘇，其所自命者，文章已矣。”這一段就和宋明理學家、朝鮮李滉等也有判然不同之處。因為朱熹等一般理學家認為古文家在‘文’與‘道’的問題上多偏向‘文’而所講的‘道’不够醇正，所以多有微詞，可對他們的文章本身還是褒多於貶的。如朱熹和朝鮮李滉雖都是代表各時代的理學大宗師，但他們也對韓、歐的文章基本持褒多於貶的態度。可丁茶山則不但不予褒揚，還認為因“韓、柳、歐、蘇”所“自命”的只有“文章”，所以還不如“楊、墨、老、佛”皆欲以克己斷慾，為善去惡。”者。無論這種見解的妥當與否，這在稍有儒學氣息的文人學者處是非常罕見的。

他接下來批評“今之所謂文章之學”的人，他們“又以彼四子者，為淳正而無味也。”，即又把茶山自己甚不以為然的唐宋古文家“韓、柳、歐、蘇”看作“淳正而無味”的，再變本加厲“祖羅、祧施、郊麟、禘螺而尤侗、錢謙益、袁枚、毛甡之等”，可就茶山看來，這些明清文人不過是“似儒似佛，邪淫譎怪，一切以求眩人之目者”而已。可“今之所謂文章之學”的人却把這些文人捧為“宗”“師”。他對明代小說、戲曲有這種看法是無可厚非的，因為就中國明清文人學者裏面有此看法的也大有人在。何況朝鮮朝野當時對小說、戲曲的文學價值的認識都很膚淺，甚至常把小說的內容和歷史事實混淆不清的情況發生。

至於明末清初如尤侗、錢謙益、袁枚、毛甡之等詩詞家的文風，茶山也認為“又淒酸幽咽，乖拗犖確，壹是可以銷魂斷腸則止，遂以是自怡自尊，而不知老之將至。”，所以其禍害又不止於韓、柳、歐、蘇之流而已”。最後他還以“終不可以攜手同歸於堯、舜之門者，文章之學也”做總結，可見他處處不忘“歸於堯、舜之門”，並以此為學問和文章的宗旨。我們從茶山這些觀點本身之外，還能看到茶山對明清之際乃至和他同時期中國文學和文人的概況都有一定的了解的事實。

總而言之，他的這種文章觀與既有的古文家、理學家的傳統文人學者相比，乍看相似，但仔細看和誰都不一樣。有些觀點，就似曾相識，但細看又有很大的區別。另外，還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凡有儒學氣息的文人學者，一般不是推舉韓、歐，就是推舉程、朱，可茶山則似乎都沒推舉，一則貶另一則略而不提，這是和包括朝鮮李滉在內的傳統學者有很大不同的地方。

2. 文體改革論

如上所見，茶山對中國歷代及同時代文學的發展演變軌迹和其得失掌握得相當仔細，只是因他論文難免受到他論文的視角和立場的限制，其論文之客觀得當與否則另當別論。他因對文章具有如上述“文章之學”所論般的認識，有非常強烈的改革的意見。因這篇文章是茶山二十三歲年輕時應正祖之命寫的對策文，是用和國王對答的形式寫成的，所以文中有很多是客套話。這是在正祖憎惡從清朝引進的稗官雜說瀰漫在整個朝野，所以要求年輕的茶山交出應對之策的情況下寫的。所以我們嚴格說來，裏面所說的未必盡是茶山肺腑之言，即不能排除有些為迎合正祖而違背己意的成分。但無論如何，這篇文章畢竟是出自茶山之手的，所以我們也有必要探討一番。他說：

王若曰，文有一代之體，而與世道相汗隆，談其文，可以論其世也。

臣對曰，……臣以爲天地間大文章，莫如物態人情，善觀乎物態人情之變，則文體之變，可得而言也。何則？臣嘗觀物態矣……而求其故則總不外利害兩端。資於物態，發於人情，顧文體奚獨不然？醇者醜，樸者斲，平易者奇詭，敦實者淺薄，典雅者鄙俚，舒緩者促急，形形色色，千變萬化，而求其故則不出於得失二字。夫冷焉則物不趨之，害焉則人不嚮之，失焉則文體可得而變也。……昔董仲舒有言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然後統紀一法度明，而民知所從。”臣抱茲耿耿，思欲一陳者久矣。……周道降而策士縱橫，漢業弘而西京《爾雅》，之文之體，孰使之然歟？二陸迴映之詞，珠流璧合，六朝綺麗之唱，鳥過花飄，世亂則同，而文體之異，何歟？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而不能回既倒之瀾，輕縑素練，窘於邊幅，而不害爲明時之輔，抑亦文體之得失，不關世道之盛衰歟？欲革浮華而《大誥》是作，黜去險怪而學體丕變，庸俗之方，本不在於言語，而正趨之要，豈不外於取舍歟？俚之而有宮體、俳體之譏，詭之而有時學、時文之諂，是將氣格之隨人，而莫之可矯歟？無或獎進之失宜，而轉而成習歟？……臣以爲執跡而論，俱不必厭薄矣。宇文能作《大誥》，歐陽一變學體。噫！回淳反朴，自非後世之能及，黜險取易，不過一時之成效，臣以爲其功不足多也。¹⁰⁾

10) 《與猶堂全書》，第一集詩文集第八卷○文集 / 對策 文體策 己酉（1789）十一月親試。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MO_0597A_0080_010_0090_2004_A281_XML

茶山在叙述一番自古至今文體演變的情況以及其得失，另外也指出所以有那些得失的各種緣由。茶山認為因國王擁有其利害得失的權柄，應以此疏導文風。這在如他認同西漢“董仲舒的“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然後統紀一法度明，而民知所從。”的方法的叙述中可見。至於“宇文能作〈大誥〉，歐陽一變學體。噫！回淳反朴，自非後世之能及，黜險取易”認為只“不過一時之成效”，認為其功勞仍有限。

近來文風漸變，其所謂操觚之士，不本乎六藝之文，埋頭用心，反在於稗家小品，發而為詩文，駢儷之作，筆未落地，氣已索然，譬如昏睡之人，時作譫囈，自以為極其巧透其妙，而不成葫蘆之畫，殆同迷藏之戲，用之鄉黨，而反不如學究陳言，用之朝廷，而無以行大小詞命。予為是悶，每對筵臣，未嘗不以變文體之說，反復申戒，而聽我藐藐，成效漠然。如欲一洗啁啾之陋，咸歸醇正之域，以成一代之體，俾新八方之觀，其道何由？

稗家小品之弊，大小詞命之作，臣於平日，竊有所慨然者，茲不敢隱也。臣以為彗、孛、虹、彗，謂之天災，旱、澇、崩、渴，謂之地災，稗官雜書，是人災之大者也。淫詞醜話，駭蕩人之心靈，邪情魅跡，迷惑人之智識，荒誕怪詭之談，以騁人之驕氣，靡曼破碎之章，以消人之壯氣，子弟業此而箠籬經史之工，宰相業此而弁髦廟堂之事，婦女業此而織紵組紃之功遂廢矣。天地間災害，孰甚於此？臣謂始自今，國中所行，悉聚而焚之，燕市買來者，斷以重律，則庶乎邪說少熄，而文體一振矣。¹¹⁾

其實，正祖命他寫該〈文體策〉和茶山該文的寫作用意在改革當時的文風，即因有“近來文風漸變，其所謂操觚之士，不本乎六藝之文，埋頭用心，反在於稗家小品，發而為詩文，駢儷之作，筆未落地，氣已索然，譬如昏睡之人，時作譫囈，自以為極其巧透其妙，而不成葫蘆之畫，殆同迷藏之戲，用之鄉黨，而反不如學究陳言，用之朝廷，而無以行大小詞命。”

所以他把平時持有的改革文體之法向國王陳述一番。他說，因為平時沒人聽從他如此耿耿之心，感到很納悶。他的關心和目的在於“欲一洗啁啾之陋，咸歸醇正之域，以成一代之體，俾新八方之觀”。因此他甚至把明末清初從中國引進而彌漫在朝

11) 《與猶堂全書》，第一集詩文集第八卷○文集 / 對策 文體策 己酉（1789）十一月親試。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MO_0597A_0080_010_0090_2004_A281_XML

鮮朝野的稗家小品之弊當作是“人災之大者”，與天災、地災相提並論。他還加以認為那是“淫詞醜話，駭蕩人之心靈，邪情魅跡，迷惑人之智識，荒誕怪詭之談，以騁人之驕氣，靡曼破碎之章，以消人之壯氣，子弟業此而筮籙經史之工，宰相業此而弁髦廟堂之事，婦女業此而織紵組紃之功遂廢矣”，即他認為那些淫穢、荒誕、破碎的小說之類的文章是百害而無一益的，是一無是處的。茶山進而主張“自今國中所行，悉聚而焚之，燕市買來者，斷以重律”以求收到“邪說少熄，而文體一振”的效果。

噫！詞命之用駢儷，非古也。雖然，事大交鄰，已成式例，今不可猝變。但臣竊觀唐、宋間儷文，平仄相間，一如律詩之法，至我朝，近日亦有此體，湖堂月課，或有以此應者，謂之律表，其實中國儷文，無古無今，本來如此，不拘平仄者，惟我東有之，此亦僻陋之一端。臣嘗觀燕京賀表、賀箋等文字，一一皆然，我國表箋之見笑於彼人必矣。不亦可恥之甚乎？臣謂始自今，此等文字，一以律表為式，而國中所用頒教、頒赦等文，亦用此法，則亦為正訛之一端矣。

嗚呼！文風之不雅，莫我東若也，文體之日喪，莫近日若也。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乃殿下惕然思懼，思所以一變其道，此正杜邪逕啓正路之會也。苟殿下欲之，何患乎文體之不變也？雖然，君子主張世道，所以行之者勸懲，勸懲之要，惟在取捨之權。昔洪武間高皇帝詔正文體，若曰：“惟務直述，不尚文藻。”其後又有正文體之議，楊元祥、李廷機等，具有獻議，若曰：“明示天下以所取捨，使人望表而趨。”

噫！錦繡、珠玉之美，苟人主之嚴禁，而衣之者見棄，佩之者抵辟，則必將相率而毀棄之。矧虛文假飾，本非作者之所樂為哉？夫周鼎、商彝之器貴於庭，則淫巧之工棄矣，黃鍾、大呂之音作於堂，則倡優之樂廢矣。誠能本之以禮樂，齊之以取捨，使一世之文，明白如日月，正大如山嶽，渾乎如大圭，冲乎如大羹、玄酒，而其和平雅暢，如奏韶、濩於清廟明堂之上，則彼決裂零瑣，若擊濕鼓叩腐木，羅螢燐列餽釘者，皆將不期滅而自滅矣。臣以為始自今，凡於館閣應製、饗庠試藝之文，莫不以是為準，嚴其取捨，而場屋文字，不拘定式，雜試各體，則曩所謂業散文者，亦將霞蔚而鵲起矣。何患乎文體之不變也？

抑臣未敢知殿下之所嘗反復申戒者誰歟，其聽之藐藐而使成效漠然者誰歟？自古帝王之圖大事成大功者，未嘗無一二良輔以左右之也。堯非夔，無以作〈大章〉，武王非太公，無以治軍旅，高帝非叔孫，無以起朝儀，唐非陸贄，宋非歐陽修，無以知貢舉變文體也。今人才雖曰沓然，歷數殿下之廷，亦豈無堯一夔也？是說也，臣誠為殿下誦之。臣謹對。¹²⁾

他還對朝鮮駢儷文的流行情況認為：“詞命之用駢儷，非古也。雖然，事大交鄰，已成式例，今不可猝變。但臣竊觀唐、宋間儷文，平仄相間，一如律詩之法，至我朝，近日亦有此體，湖堂月課，或有以此應者，謂之律表，其實中國儷文，無古無今，本來如此，不拘平仄者，惟我東有之，此亦僻陋之一端。”，即他認為駢儷文雖來自中國，有“他事大交鄰，已成式例”的現實需要，故有不可“猝變”的，但與唐、宋間儷文相形之下，可知朝鮮的駢儷比之中國還變本加厲，不如中國的自然協律，過分拘泥於平仄，難免顯得更加僻陋。所以他進而認為朝廷有必要重新定律表，以免見笑於清朝文人。又進而認為“君子主張世道，所以行之者勸懲，勸懲之要，惟在取捨之權。”，因此隱然要求國王正祖借用這“取捨之權”改變連場屋文字也在內的僻陋不堪的文風。

最後，丁茶山也期望正祖起用如堯之夔、周武王之姜太公、漢高帝之叔孫通、唐之陸贄、宋之歐陽修般的得力輔臣協助，隱然可見有自命之意。值得我們一提的是唐沒取韓愈而取陸贄，宋亦沒取朱熹而取歐陽修，即在此對歐陽修在宋代文風的改革上所發揮的作用加以肯定，這又和前面所述有些出入。這可能和這一篇是他年輕時所寫有關。

3. 詩文創作論

茶山雖自己說不愛寫詩，不寫無用之文，可我們從他的詩作就有將近2500首的事實可見，他也不是不愛作詩文者。另外，因他有做為父親、學術界上的長輩的身份地位，尤其在謫居康津經常和遠在家鄉的兩個兒子、親友或晚輩問答交流時也難免涉及談論詩文作法等問題，這時便告訴包括兩兒在內的晚輩或親友們以自身的學習詩文的經驗和取捨觀點也是很自然的。我們也可從中看出他有關詩文創作觀點。他每論及詩文時也時時表露他自己的治學宗旨不在詩文，說自己不喜歡詩律，著書也要以經籍為宗，其次是經世致用之學。如他曾說：

12) 《與猶堂全書》，第一集詩文集第八卷○文集 / 對策 文體策 己酉 (1789) 十一月親試。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MO_0597A_0080_010_0090_2004_A281_XML

余性不喜詩律，辛酉（1801）以前，槩是應求塞徵，或有漫興閒吟，都非經意用力者。洎自流落，所作不能無酸楚，緣余平生，恥柳子厚謫中諸文，率多咽咽淒悲語，遂廢之。及既年深，處坎如夷，或登山臨水，懷緒曠達，發之為詩，辭旨豪宕。然至樂在於經傳，竟不肯留心推敲，集中諸詩，多不愜意。¹³⁾

這段的意思是他原本不喜歡寫詩，但從1801年被流放後開始寫詩，並且自我告白，因原本就不喜歡柳宗元貶謫時期寫的“咽咽淒悲語”，而自己被流放後便能不像柳宗元“處坎如夷，或登山臨水，懷緒曠達，發之為詩，辭旨豪宕。”勝柳一籌，而其“至樂”仍不在詩文，還是“在於經傳”。他又說：“大較著書之法，經籍為宗，其次經世澤民之學，若關防器用之制，有可以禦外侮者，亦不可少也。若夫瑣細零星之說，苟取一時之談笑，與夫陳腐不新之談，支離無用之論，徒費紙墨，不如手植珍果佳蔬，以博生前之生理也。（1808中夏）¹⁴⁾他在此把他重經尚用的文學觀講述得很清楚。他認為“若夫瑣細零星之說，苟取一時之談笑，與夫陳腐不新之談，支離無用之論，徒費紙墨”，即他認為與其寫如此的文章，倒不如種樹種菜更有實在的價值。我們看，其實他所謂的“若夫瑣細零星之說，苟取一時之談笑，與夫陳腐不新之談，支離無用之論”才是比較接近我們現在意義上的文學作品。不過，他認為這樣的作品就毫無價值。可見，他對具有純文學性文章的價值則不予認同。所以我們現在可看到的他有關詩文創作論方面的意見多不是在專文裏談到的，而是在其書簡裏無意中表露出來的居多。但他又有時候也不完全排斥寫詩，還部分肯定寫詩行為的價值說“詩非要務，然陶詠性情，不為無益。”¹⁵⁾。他的意思就是我們雖不能把它當做很重要的事情看待，但還是有助於陶冶性情這一值得肯定之處的，這一點就和宋明理學家如邵雍、朱熹、陳獻章等的觀點基本一致。我們也可以說這也是如同宋明理學家一樣，在為自己寫那麼多詩開一扇方便之門的意義。

1) 主張從古文古詩入手

13) 《與猶堂全書》，第一集詩文集第十八卷○文集 / 家誠 示二子家誠。

14) 《與猶堂全書》，第一集詩文集第十八卷○文集 / 家誠 示二子家誠。

15) 《與猶堂全書》，第一集詩文集第二十一卷○文集 / 書/示兩兒。

茶山在給茶山諸生的贈言裏說道：

文有多種，而科文最難，吏文次之，古文其易者也。然自古文蹊徑入頭者，卽吏文、科文，不復用功，勢如破竹，自科文入頭者，仕而爲吏，判牒皆藉人手，有求序記碑銘者，不數字，已醜拙畢露。由是觀之，非科文之果難，而爲之失其道爾。余昔教子淵科詩，先從漢、魏古詩，寸寸摸擬，漸識蘇、黃門路，覺手法稍滑，令作科詩一首，初篇已被諸先生獎詡。後來教人用此法，無不如淵也者。秋熟子落，水到渠成，理所然也。諸生須求捷徑去，勿向犖確藤蔓中去。¹⁶⁾

他先把文章按其難易排成科文、吏文、古文的順序，然後說學習時要從“古文蹊徑”入手，那吏文、科文就迎刃而解，反之就“不數字，已醜拙畢露。”，科舉用的詩歌也未嘗如此，他把在教他兒子淵科詩的成功經驗告訴諸生說“先從漢、魏古詩，寸寸摸擬，漸識蘇、黃門路，覺手法稍滑，令作科詩一首，初篇已被諸先生獎詡。後來教人用此法，無不如淵也者。秋熟子落，水到渠成，理所然也。諸生須求捷徑去，勿向犖確藤蔓中去。”卽他在做學問的立場說是對蘇、黃就很不以爲然，但到教自己親生兒子和門生時不得不肯定蘇、黃作品的文學價值。甚至還告訴茶山諸生由先從漢、魏古詩再而蘇、黃門路是學詩的一捷徑，是不可錯過之路。這和站在文道的立場貶抑韓、柳、歐、蘇時說成“吾道之鉅害時迥然不同。

2) 鈔書之法

“鈔書”是自古文人學子學習詩文時不可或缺的方法，所以丁茶山在給兒子的書信裏也一再叮囑用此方法學習，他說：

書來慰意。仲兒筆法稍勝，文理亦有進，年齒之德耶，抑或以時肄習耶？切勿自暴，極意勤力，讀書鈔書著書，無或放過也。……鈔書之法，吾之學問先有所主，然後權衡在心，而取捨不難也。學問之要，前旣言之，汝必忘之矣。不然，

16) 《與猶堂全書》，第一集詩文集第十八卷○文集 / 贈言 爲茶山諸生贈言。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MO_0597A_0180_010_0040_2004_A281_XML

何疑於鈔書而有此問耶？凡得一書，惟吾學問中有補者採掇之，不然者竝勿留眼，雖百卷書，不過旬日之工耳。《麗史》之工，尚不下手耶？¹⁷⁾

可見他一再強調“鈔書”的有用性，說“讀書鈔書著書，無或放過”，強調“鈔書之法，吾之學問先有所主，然後權衡在心，而取捨不難”，也提醒不要盲目鈔書，自己的學問先要有所主然後再衡量是很重要的，也讓他們別懷疑鈔書之有用性。當然他之所以有此主張並不單純爲了學文，也能從中採掇有用的內容。如古文家韓愈、歐陽修、理學家朱熹、朝鮮大學者退溪等的創作論裏都有“模擬”¹⁸⁾一項，可見這是自古文人都認同的學文的法門。從他所誇“仲兒筆法稍勝，文理亦有進”中，我們也不難發現在把兒子“筆法稍勝”、“文理亦有進”的原因歸結到“鈔書”之功。

3) 詩家活潑門

茶山認爲文壇有些人不知積累學問根底，徑以直接抄襲模擬爲能事，可這就他而言是一件很可憐的事，如他說：

近一二少年，取元、明間輕佻妄客酸寒尖碎之詞，摹擬爲絕句、短律，竊竊然自負其爲超世文章，傲睨貶薄，欲掃蕩今古，吾嘗愍之。必先以經學立著基址，然後涉獵前史，知其得失理亂之源，又須留心實用之學，樂觀古人經濟文字，此心常存‘澤萬民育萬物’底意思，然後方做得讀書君子。如是然後，或遇煙朝月夕，濃陰小雨，勃然意觸，飄然思至，自然而詠，自然而成，天籟瀏然，此是詩家活潑門地。勿以我迂也。¹⁹⁾

茶山認爲應該“先以經學立著基址，然後涉獵前史，知其得失理亂之源，又須留

17) 《與猶堂全書》，第一集詩文集第二十一卷○文集 / 書 答二兒 以下康津謫中書。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MO_0597A_0210_010_0020_2004_A281_XML

18) 雖這“模擬”和“鈔書”之意不盡相同，但從茶山語氣中可知這“鈔書”裏面應還包含“模擬”之意。

19) 《與猶堂全書》，第一集詩文集第二十一卷○文集 / 書 寄二兒 壬戌十二月廿二日康津謫中。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MO_0597A_0210_010_0020_2004_A281_XML

心實用之學，樂觀古人經濟文字”，然後心存‘澤萬民育萬物’的意思，成為讀書君子後，再觸物生情，“飄然思至，自然而詠，自然而成，天籟瀏然”才是“詩家活潑門”。這是在謫居時期寫給兩個兒子的書信中的文字，應是他出自內心的肺腑之言，故最後也擔心兒子懷疑謂“勿以我迂也”。即他認為“詩家活潑門”非他，學詩要從經典、前史、實用之學、古人經濟文字循序遞進，然後心裏常懷“澤萬民育萬物”的心。可見他和既有的傳統文人學者不同，把相當的分量放在實用之學、古人經濟文字、澤萬民育萬物等問題的關注上，顯現其做為‘實學’代表人物特有的面貌。這一點也很值得我們注意。

4) 作詩講究詩格

茶山在寫給兒子的書信裏諄諄教導作詩必須講究的內容，包括氣象、內容、詩歌格律、風格等問題。他說：

樊翁²⁰於詩，甚觀氣象，余每讀劉誠意詩，氣象多帶淒酸，少陵詩多繁華貴富語，卒有耒陽之窮，謂未必盡有符驗。近日余檢余箱中舊藁，風霜以前，翱翔乎金馬玉堂之間，而所作詩篇，皆淒楚壹鬱，至長髻謫中詩，尤幽咽可悲，至康津以後之作，多曠達恢廓之語。意者菑害在前，既不得有此氣象，自效以往，庶乎其無憂也耶？先輩之言，不宜輕聽。然全要氣象華麗，却不成詩，大抵要有精神氣脈。若散漫蕭索，無結束關鎖之妙者，窮達姑捨，年壽不長，此余婁試者也。

《詩》三百篇，皆賢聖失意憂時之作，故詩要有感慨。然極須微婉，不可淺露。

七言古詩，格律最多，大較平入上去，必要錯雜押去，以平承平，以入承入者，絕無也。東人尚不知此。若韻脚既平，則對眼必用仄聲，以平對平者，無有也。又如〈長安古意〉，字字叶律，每四句各為一章，如絕句然，茲所謂連環律法也。若通篇只用一韻者，無此律法。沈鬱頓挫，淵永閒遠，蒼勁奇崛，此十二字，詩家宗旨，若夫縟麗濃妍，亦不可少也。（嘉慶戊辰中夏之閏，書於茶山）²¹

20)指蔡濟恭(1720-1799)字伯規，號樊巖、樊翁，朝鮮文臣。

21)《與猶堂全書》，第一集詩文集第十八卷○文集 / 家誠 / 又示二子家誠。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MO_0597A_0210_010_0030_2004_A281_XML

茶山在這幾段較長的文字裏先談論蔡濟恭(1720-1799)、劉基(1311-1375)、杜甫(712-770)以及茶山自己各時期詩歌的氣象之不同，然後說到自己各時期詩歌氣象之所以不同的緣由。然後，再說不能刻意追求某種氣象，否則“却不成詩”。另外，詩歌如《詩》三百篇，“要有感慨。”但要“極須微婉，不可淺露”，即別太直露，要多用比興之謂。茶山接著又說固然七言古詩，格律最多，不過既然要寫詩則也要符合其複雜的格律方可。然後再談詩歌的風格方面，舉出除了詩家最值得追捧的“沈鬱頓挫、淵永閒遠、蒼勁奇崛”這十二字的宗旨之外，還加了一個“縝麗濃妍”，說這也是“不可少”的，可知他認為論詩歌風格要以“沈鬱頓挫、淵永閒遠、蒼勁奇崛、縝麗濃妍”為主格。

以上，我們從可對茶山文學觀的形成產生影響的大背景開始，再對茶山文學觀點中分量較大的幾點著手探討了一番。

四、結論

茶山的文學觀點和他學術思想一樣，不再停留在程朱等理學家的藩籬裏，故有不少自己的特色。

因茶山與李滉、曹植、李珣等人相隔將近250年，所以所處時代的生活學術環境自然也有較大的差異。文學環境亦未嘗不如此，故其時代使命自然也不同，再加上他個人不尋常的遭遇，這一些無疑都造就了丁茶山的學術和文學觀點。

我們通過以上的探討，從茶山文學觀的大背景開始，再對茶山文學觀點中分量較大的幾點著手探討了一番，可得如下的結論：

茶山對文章的觀點與既有的古文家、理學家等的傳統文人學者相比，乍看之下，似乎很平庸沒什麼特別的，但我們仔細一看時能發現却和既有的文人學者都不一樣的。比較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凡有儒學氣息的傳統文人學者論文時一般不是推舉韓、歐，就是推舉程、朱，可茶山則都沒推舉，對韓、歐則貶抑多於褒揚，對程朱詩文則隻字未提，這是確和包括朝鮮李退溪在內的傳統學者有所不同的地方。

我們看茶山論“文章之學”和“文體策”，可知道雖因茶山的論文視角和立場所限，其論文之客觀得當與否則有待商榷，但茶山對中國歷代學術和文學的發展演變軌迹

和其得失掌握的相當清楚。

他對詩文的見解也和朱熹等學者文人一樣，隨著他們發言場合和立場的不同會有些出入。比如對歐陽修多有貶義，可談宋代文風的改革問題時就大力褒揚其在文風的改革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他在做學問的立場說是對蘇、黃就很不以為然，但到教自己親生兒子和門生時不得不肯定他們作品的文學價值。這和茶山站在文道的立場貶抑韓、柳、歐、蘇時說成“吾道之鉅害時迥然不同。

他文學觀點裏還有一種比較突出的特色就是他論文時明顯和既有的傳統文人學者不同，除了對儒學經籍的重視外，把相當的大的分量放在實用之學、古人經濟文字、澤萬民育萬物等問題的關注上。

總之，他雖始終不失為一儒者，很多觀點與程朱理學家的論調頗為接近，他也似乎仍以守護“吾道”為己任，可又從寧肯褒揚揚、墨、老、佛某一面而貶抑古文家韓、柳、歐、蘇的態度看，又與一貫捍衛斯道為己任的理學家不盡相同。

其實，茶山對文學的見解的遠不止這些，還有比較重要的，他對從詩經、屈騷開始，司馬遷、司馬相如、楊雄、陶、謝、杜甫、唐宋八大家以至明清文人、學者以及朝鮮學者都有些說法，可繼續研究。

參考資料

一、丁若鏞著作

丁若鏞，《詩經講義》《詩經講義補遺》（合刊本）（漢城：成均館大學校，1995年），詩經. 9./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 79。

丁若鏞，《與猶堂全集》，收錄於杜宏剛等主編《韓國文集集中的清代史料.(一三)-(一四)》（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二、其他中文專著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四部叢刊本。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馬積高，《宋明理學與文學》，（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

- 廖可斌, 《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
陳來, 《宋明理學》, (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1年)。
金彥鍾, 《朝鮮丁若鏞論語說之精義》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 1992年)。
安贊淳, 《明代理學家文學理論研究》, (臺灣大學博士論文, 1999, 萬卷樓出版, 2016年)。
莫礪鋒, 《朱熹文學研究》,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0年)。
蔡振豐, 《朝鮮儒者丁若鏞的四書學：以東亞為視野的討論》,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年)。
李士金, 《朱熹文學思想研究》,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3年)。

三、韓國專著

- 丁奎英 編, 《丁茶山全書-年譜》 (漢城：文獻編纂委員會出版部, 1961年)。
李乙浩, 《丁茶山의 生涯와 思想》 (漢城：博英社, 1991年)。
崔益翰, 《實學派와 丁茶山》 (漢城：한국문화사, 1996年)。
白閔政, 《丁若鏞의 哲學》 (漢城：이학사, 2007年), 問津。

四、學術期刊

1. 中國兩岸學刊

- 蔡茂松, 〈韓儒丁茶山反朱學內容之研究〉,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 4卷, 1977年, 頁131-17
黃愛平, 〈論清代乾嘉時期的經世思潮〉, 《中國哲學史》, 1997年 第4期, 頁92-101。
蔡振豐, 〈丁若鏞的四書學〉, 《臺大文史哲學報》, 2005年, 頁171-188。
單江東, 〈禮失而求諸野—評韓國碩儒丁若鏞的《與猶堂全書》〉, 《漢學研究》, 2015年06月, 頁512-518。
高在錫、尹錫珉, 〈茶山丁若鏞思想的脫性理學特性—以天觀和性論為主〉, 《哲學與文化》, 2017年, 頁139-153。
鄭令媛, 〈丁若鏞《詩經講義》與朱子《詩》說對比研究〉, 《朱子學年鑑》, 2018年09月, 頁284-285。
金玟, 〈丁若鏞哲學本體論研究：當代新儒家與天主教思想之比較為中心〉, 《哲學與文化》, 2020年, 頁131-145。
蔡慧崑, 〈《詩經》諷諭精神之傳承—朝鮮詩人丁若鏞「三吏」對杜甫「三吏」的接受與轉化〉,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 56期, 2021年, 頁21-39。

2. 韓國學刊

- 崔信浩, 〈丁茶山 文學觀〉 - 그의 書簡을 통해 본 思想의 단면 -, 한국한문학 연구 1권, 1976, 頁119-133.
- 金相洪, 〈茶山의 文學思想〉, 동양학10권, 1980, 頁1-28.
- 宋載邵, 〈茶山 丁若鏞의 文學論〉, 대동문화연구 18권, 1984, 頁139-150.
- 金彦鐘, 〈丁茶山の 中國歷代文人에 대한 評價〉 - 한(漢), 당(唐) 중심으로 -, 한국한문학연구 7권, 1984, 頁191-219.
- 채미화, 〈茶山 丁若鏞의 文學思想 研究〉, 한문학논집10권, 1992, 頁193-204.
- 李先漢, 〈丁茶山 文學觀의 考察〉, 인문학연구 25권, 1995, 頁123-150.
- 田京源, 〈茶山 丁若鏞의 四言詩와 詩經論 및 詩認識의 상관성〉, 우리어문연구 28권, 2007, 頁223-252.
- 김중서, 〈「詩經講義總論」에 보이는 茶山の 詩經 認識〉, 한문학보 19권, 2008, 1201-1237.
- 金相洪, 〈茶山の 蘇洵, 蘇轍論〉, 한국한문학연구 43권, 2009, 頁225-252.
- 申斗煥, 〈茶山の 流配 漢詩에 나타난 屈騷의 美意識〉, 한문학논집 28권, 2009, 頁125-151.
- 정일남, 〈茶山 丁若鏞의 “屈騷” 受容 樣相〉, 한국한문학 46권, 2010, 頁387-415.
- 尹寅鉉, 〈茶山の 儒家 文學觀과 詩文學〉, 한국학논집 36권, 2013, 頁187-219.
- 윤석화, 〈茶山の 四言古詩에 나타난 『詩經』의 수용 양상〉, 한문학논집 40권, 2015, 頁109-138.
- 柳素眞, 〈丁若鏞의 유배시기 和蘇詩에 나타난 심리적 기제〉, 中國文學 제93집, 2017, 頁235-253.
- 柳素眞, 〈丁若鏞의 시와 생활에 투영된 蘇軾〉, 中國語文學 제76輯 2017, 頁61-92.
- 安贊淳, 〈朱熹和陳獻章文學觀點之比較〉, 中國散文研究集刊 第8集, 2018, 頁136-168.
- 安贊淳, 〈從與朱熹的比較看李滉的文學觀點〉, 中國語文學論集 濟118輯, 2019, 頁423-447.

五、學位論文

南明鎮, 《清初學術與韓儒丁茶山實學思想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
博士論文, 1985年。